

香港當代新詩史

古遠清 著



香港人民出版社

香港当代新诗史

古远清 著

香港人民出版社

书 名：香港当代新诗史
作 者：古远清
主 编：陈玉玲
责任编辑：蔡友谋 吴晓萍
封面设计：红 雨
出 版 者：香港人民出版社
地 址：香港屯门井财街七号力生大厦2字楼E楼
出版时间：2008年9月
版 次：第一次出版 第一次印刷
开 本：18开本（170 × 230cm）
印 张：19.7
字 数：215千字
印 数：01 - 1000 册
书 号：ISBN978-962-8944-07-1
定 价：港币 80 元 人民币 80 元

前 言

据香港文学研究专家黄维樑透露：香港艺术发展局曾悬赏三百万元请港人编写香港文学史，然而重赏之下没有勇夫，至今连写史的一点踪影都没有：“十年、二十年已过去了，香港人编写的香港文学史，我们仍然痴痴地等……”(1)之所以等不到，不妨回顾2002年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艺术组组织本地学者编撰香港文学史时，“会议终于没有好好地着手寻找‘谁来编文学史’，而演成‘大家怎么看编文学史’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难以选到最具资格的人“当上这部香港文学史的总编辑、总主笔”。众所周知，“香港文学界门派甚多，目前还未有几多人能做到兼容并包及具备了文学历史的纵观水平……再说，要等一位能沟通各派作者文友，而个人文学思想又能兼收并蓄的编写者，谁也不知道将会在什么时候降临大地、光临香港。”(2)

既然香港难觅“能沟通各派作者文友”的学者，既然他们把香港文学史的诠释权拱手让给别人，外地学者便“空降”香江文坛，当仁不让地写了起来，以至出版了数种颇受争议的香港文学史。

在当下名目繁多、乱花迷径又不被众多香港作家、学者认同的香港文学史研究中，《香港当代新诗史》仍是十分寂寞的领域。2006、2008年，广东和福建分别出版有《香港当代小说史》(3)、《香港小说流派史》(4)，但至今仍未有人为香港新诗写史。笔者告别杏坛后，在赋闲中居然让《台湾当代新诗史》(5)“下蛋”，生“第二胎”《香港当代新诗史》，我为自己没有辜负二十多次访港取得的资料感到庆幸。

也许读者会问：台湾诗坛与香港诗坛有明显的文化差异，怎么可以把“香港新诗史”看作是“台湾新诗史”的“直系亲属”呢？这是

个复杂问题，在这里我只能笼统回答：台湾、香港本来就有被“割让”的相似历史遭遇。在地理位置上，两地均属大陆的离岛。在意识形态方面，两地均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主旋律”。他们的新诗比起内地新诗来，有太多的同质性。何况作为跨文化城市的香港，那里有不同背景的文化经验共存和交汇，比如在台湾诗坛颇为活跃的叶维廉、余光中等人，便是香港诗坛的要角。关于这一点，本书第二章第六节有较详细的说明。

不是我故作谦虚，《香港当代新诗史》对我来说确是“拣”的，“拣”了个金元宝。毕竟写完了《台湾当代新诗史》，写《香港当代新诗史》就顺理成章，下笔也顺畅多了。说“拣”或说下笔“顺畅”，决不是说香港新诗史容易写或暗含藐视香港诗人的意思。相反，香港新诗界有不少璀璨的名字，他们的光环逼使我总是睁大眼睛去审视他们。我既庆幸自己和这些相识或不相识的诗人心灵是如此贴近，但我又担心自己的拙笔不能将他们的文学成就一一道出。应说明的是，《香港当代新诗史》并不是《台湾当代新诗史》的附庸或骥尾，两者有各自的独立性，但台港新诗确有“亲戚”关系，可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至四节。

作为生活在高度商业化社会的香港文化人，和台湾文化人一样从来都寂寞，作家获得的掌声稀罕，诗人的读者更少，希望我这本小书的出版，能给诗集问世后如泥牛入海无消息的香港诗人一丝安慰。我这本书可以告诉他们：“别害怕诗集出版后杳如黄鹤，至少在黄鹤楼畔有古远清这样的有心人在仔细读你的作品，有时还挑你的毛病”。更希望那些至今仍抱“香港是文化沙漠”偏见的人，读了拙著后能惊喜地发现，这里还有一小批诗人在香港这个水泥岛上种植新诗之树，有的树开的花还似紫荆那样散发出醉人的芬芳。

笔者未做官，不应酬，不打牌，也未指导研究生，跟外界交往甚少，忽然有朋自远方来，在一个夏日访我：“你为什么只写香港文体史，而不写通史？”答曰：“我最熟悉的门类是新诗和文学批评，不敢贸然跨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客又问：“你写了四种台港文学分类史，有

无‘难言之隐’或‘难以释怀’的事情？”问得唐突，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后来仔细一想，如果说要有什么难言之隐，是无论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山头“艳帜”高挂，不少圈内人互相瞧不起圈外的作品，以忽视别人的存在为荣。他们不读别人的作品却非常看重别人读不读自己的诗作及读后又如何评价。如果你真的去评价，评了他不同山头或不喜欢的诗人，他就有可能编织各种流言，说评者与被评者幕后一定有交易。当这种流言一再向我袭来时，我也就见怪不怪。只要他不像余秋雨那样因学术论争将我告上法庭，也就不愿让这种尘封往事再扬起尘烟。

本来，在内地做新诗史研究，既不可能带来财富，也不可能带来太多的欢乐。写作过程，既枯燥又折磨人。为了查一条注释，常常花掉一个昂贵的下午。我过惯了寂寞清苦而孤独的书斋生活，到生命之秋仍不打算放弃买书评书写书出游这一嗜好，也算是一种坚守。

笔者深知，作为评论家，必须坚守严肃的学术立场。不管自己相识或不相识的诗人，相识是亲近还是疏远的作家，也不管自己喜欢的作品还是不符合自己审美要求的作品，都要去读，都要去评。不看刊物编辑的眼光行事，不看被评对象的脸色，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这需要气量，需要胸怀，需要学识，需要勇气，更需要睿智。那怕是挖苦讽刺批判过我的人，只要他的文本优秀，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照样欣赏他，照样将其写进文学史，而且给的篇幅还不会少。又如某位诗人，甚多人对他的人品嗤之以鼻，我对他也有微辞，但考虑到他在香港有一定代表性，其诗作也有水准，故我还是不



听友人劝告毫不犹豫写了他。

不妨向读者交代一下自己的写作环境。我从1992年起就享有不上课的“特权”，专事写作；到了新世纪，时间仍完全属于自己支配。比起那些担任行政领导或指导博士生的导师来，我清闲得多。我还喜欢到世界各地淘书。每次访台访港或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均以第一时间到书店报到。但许多诗歌资料在书店里是根本买不到的。我敢说，就是香港本地人，也难以拥有各种不同派别作家的诗集、诗刊。搜集资料之难，尤其是像我生活在武汉这样的中部城市而无法像闽粤学者那样拥有“近水楼台”，这也是我写作时的又一难言之隐吧。

内地的一位诗刊主编说：“‘难言之隐’有之，‘难以释怀’有之，苦辣酸甜有之。”我虽然不做编辑工作，但写诗史同样充满了酸甜苦辣的感受。使我难以释怀的诗坛掌故或秘闻，以及遭人误解，遭到围攻，甚至遭人“暗算”，目前都还无法公开。不过，我宁愿更多回味写史过

程中得到友人的帮助。如一位年过古稀的诗人，听说我研究香港新诗，便数次抱病到九龙各书店为我代购参考书。我每次去港，和各个山头的香港作家、诗人见面，在漫无边际的交谈中得到启发，了解到书本上看不到的一些诗坛秘辛。虽然这秘辛仍不便写进书中，但对我加深香港诗坛的了解仍有助益。



本书作者在岭南学院任客座研究员，
1993年

中国古代有江郎才尽的故事，放眼内地学界，也可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不过，“才尽”应与年龄无关，而与对研究现状、研究题材和研究对象失却敏感相联系。“才尽”的人往往找不到新的学术生长点。我为了将自己和“江郎”区隔开来，近几年在两岸三地出书时均尽可能出新，不至于“把破帽，年年拈出”。

不过，在香港新诗研究领域出新比较难。不可否认，诗的气氛香港既不比上内地，也比不上台湾。如也斯这样重量级诗人都感叹自己发表诗作非常困难，只好把它寄生在《电影》双周刊、妇女杂志《妍》这类非文学刊物上。在这种气压下，难造就大师级的人物，也难找到经典著作，可供写史的内容远不如台湾诗坛丰富复杂，但这里仍有不少优秀作品和著名诗人，因而我把自己发现的学术生长点尽可能写进去，并注意内容和文笔的生动，使这本书不至于太沉闷和太单调。还应说明的是，本书写的许多史实，不少都是靠笔者十多年前在岭南大学、中文大学工作时跑遍香港各大图书馆和旧书摊搜集到的。每当查到一则罕见的资料或购到一本急需的书，常高兴得彻夜难眠。听着吐露港的涛声，或望窗外摩利臣山道郁郁葱葱的密林中跳跃的松鼠，再回味刚逛过的旺角二楼书店，真感到不虚此行。想到这一切都是在香港，从罗湖桥跨过后就感到这里空气要自由得多，读书和出书无禁区更是羡煞我们这些内地学人。人称香港是购物天堂，我却认为香港是购书天堂。如果没有这些满坑满谷不同观点不同色彩的台港书，我这本书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香港当代新诗史》所评述的主要是一九五〇年代至二〇〇七年香港华文诗歌的发展状况，即从老一辈的本土诗人到新世代本土诗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南来诗人”及“外来诗人”，挑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勾划出香港当代新诗的发展轨迹。个人水平有限，不见得这些入选的作品都能代表香港新诗的成就，但毕竟是一家之言。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无论是追溯新诗的发展轨迹，还是具体评论作家作品，为诗人诗作做文学史的定位，都注意诗人所处的时代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当代新诗史与思想史、文化史均颇多牵连。不仅外部环境的制约，也有诗坛派别的互相撞击。如果研究新诗史就作品论作品而不顾及诗坛论争、诗论建设尤其是思想文化史的影响，这样写出来的新诗史必然跛脚。在香港当代新诗史的分期处理上，原想来个突破，将其分为两大部分，即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代为上编，一九七〇年代至

当下为下编，但考虑再三，觉得这样一切为二，不仅简单，而且武断，因而只好在第一章使用十年为一期的老套方法。至于香港当代新诗史应从何写起，从大批文化人北上参加内地建设而右翼文人南来算起，还是从本土化开始的1970年代写起，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取宽标准，把不具有本土意识或本土意识淡薄、缺乏香港特色的南来诗人的作品也包括在内。香港新诗不一定均指具有本土意识的诗，还应包括在中国大视野下或中国语境下的创作。如果只要本土而不要南来，视南来充其量只是“在香港的内地作家”，或“本土”只要“本土生”而不要“本土长”，也就是单纯用本土意识或曰香港意识去诠释香港当代新诗史，这是一种见树不见林的偏狭思考。

这不是因为自己没生长在香江边，或与某派关系密切，而是因为香港文化来源于它的多元竞争价值，来源于它超越政治、超越党派、超越山头以及地域局限的宽容态度，故写史一定要讲究包容性，要用创新思维来处理本土与南来的关系。好在香港两大派的对峙不像台湾“外省”与“本省”那样壁垒分明。本书主要从审美着眼，对这意识形态光谱就留给那些有兴趣的人去仔细阐释吧。



首届香港文学节主讲嘉宾：曾敏之（右）古远清，1997年

如果有人问我的思想光谱，我定位为趋向开放而非教条的评论家。在2007年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上，我作了《香港文学史》写作的反思发言(6)。这发言是我最新的学术观点。这观点，在传统派看来，我也许属新潮派，而在某些香港学者看来，我又有可能像古继堂一样被划入“拥抱教条马列主义美学残骸的学者”(7)，或曰“典型的国内研究香港文学的传统派”(8)。这些评价或许值得我反省，但并不符合

我现今的研究立场。我自信，在内地学者中，我还是比较注意香港文学特点的，并没有用内地的标准去生搬硬套。

即使这样，我这本书出版后仍然可能遭到一些人严苛的批评。回想拙著《台湾当代新诗史》，在台北一出版就遭到炮轰，如一位国民党老兵出身的诗人因我否定“反共诗歌”，便说我的书就是论斤卖废品还不足一公斤哩。(9)对这种酷评，我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觉得挺幽默的，能刺激好奇的读者阅读拙著。

当我校对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标点时，抬头只见窗外是一片翠绿的竹林。时间过得真快，在“竹苑”居住六年间，我在台港和吉隆坡出版了六本以台港文学为主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新书。我真想开辟新疆土，向与我缠绵整整二十年的台港文学研究说声再见，回头去写我构思过多时的《〈文艺报〉史》、《“文革”鲁迅研究史》。但我现在还不能，不仅是因为去年批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稿》还未杀青，还因为我对上世纪末的香港新诗的评述是否符合实际没有把握，亦无法确定我对香港新诗的研究是否大功告成。有人说：当代不能写史，这种史只能称作文学概观。出于对“当代事，不成史”的反弹，本书特以“史”字做书名，这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显得庄重，另方面也是为了遏阻“搞不了古典搞现代，搞不了现代搞当代，搞不了当代搞台港”的流言，证明“搞当代文学没有学问”说法的荒谬。至于本书是否真有学术品格，只好等待着同行和香港诗人的评说与批评。

最后，要感谢连载此书的香港《作家》月刊，以及选登部分书稿的香港《大公报》、《文学研究》和《城市文艺》，北京大学的《新诗评论》以及《学术研究》、《暨南学报》、《天津师范大学报》、《西南大学学报》、《中国海洋大学学报》、《江汉大学学报》等报刊。本书所安排的一百多幅图片，不是为了赶“读图时代”的浪潮，而是想像杨义先生所说的那样“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图文并茂”。(10)这些图片除个人长期浸淫于香港文学的期刊和诗集之中而所藏外，均选自香

港各种报刊和书籍，除李华川先生的漫画外，许多摄影者均未署名，无法联系授权问题，敬希谅解。

200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十周年；2008年五一节略改于武汉

注：

(1)黄维樑：《香港人编写香港文学史》，汕头，《华文文学》2007年第3期，第44—46页。

(2)黄子程：《“香港文学史”的射杀者》，香港，《文学世纪》2003年第4期，第13页。

(3)何慧：《香港当代小说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

(4)袁良骏：《香港小说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5)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6)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5月。

(7)杨宗翰：《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第1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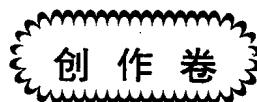
(8)张文林：《问题多多的〈文学节研讨会讲稿汇编〉》，香港，《读书人》1997年7月号，第101页。

(9)谢辉煌：《诗人·诗事·诗史——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读后》，台北，《葡萄园》诗刊，2008年夏季号，第77页。

(10)杨义：《中国新文学图志新序》。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近六十年的香港新诗	(2)
第一节 从“难民文学”到现代主义	(2)
第二节 在左右政治夹缝中寻找新的出路	(12)
第三节 香港诗人文文化身份的认同定位	(21)
第四节 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	(34)
第五节 香港新诗的主体性仍然存在	(45)
第二章 不同诗学观的交锋	(55)
第一节 检讨港台现代诗及“密码诗”战	(55)
第二节 现代诗给传统派的迷惘	(60)
第三节 有无主流和需不需要主流	(63)
第四节 《盘古》等刊物围剿余光中	(67)
第五节 关于钟伟民现象及其争论	(74)
第六节 港台新诗的交迭和冲突	(82)
第七节 频出“恶语”的资助之战	(93)
第八节 与内地文学交流的碰撞	(99)
第三章 老一辈本土诗人	(105)
第一节 “刮都市风”的舒巷城	(105)
第二节 麒南：早期现代主义代表人物	(110)
第三节 艰涩难解的蔡炎培	(113)

第四节 戴天的“大叙事”精神	(116)
第五节 西西：童话式的愉悦	(121)
第四章 中生代本土诗人	(125)
第一节 从遁世到讽世的温健骝	(125)
第二节 清新的古苍梧	(128)
第三节 关梦南：以生活抒情诗著称	(131)
第四节 代表草根声音的邓阿蓝	(134)
第五节 羁魂：以古典为貌，现代为神	(137)
第六节 壮阔幽邈的黄国彬	(139)
第七节 也斯：极具现代色彩的诗人	(143)
第五章 新世代本土诗人	(148)
第一节 基调低沉的康夫	(148)
第二节 叶辉深层次的美学嬗变	(150)
第三节 以诗传播福音的胡燕青	(152)
第四节 平淡清远的秀实	(155)
第五节 善写长篇叙事诗的钟伟民	(157)
第六节 深沉凝炼的陈德锦	(161)
第七节 罗贵祥的后现代城市诗学	(164)
第八节 王良和的咏物哲理诗	(167)
第九节 “私藏讯息”的洛枫	(171)
第十节 以时空结构著称的陈灭	(174)
第六章 五六十年代的南来诗人	(178)
第一节 徐訏：灵魂的低诉	(178)
第二节 穷愁诗人柳木下	(181)
第三节 左翼诗人何达	(184)
第四节 险被“免除”诗籍的徐速	(187)
第五节 力匡：“难民文学”的歌手	(188)
第六节 “吹现代风”的马朗	(192)

第七章 七八十年代的南来诗人.....	(197)
第一节 踏浪归来的犁青	(198)
第二节 高唱回归之歌的王一桃	(200)
第三节 王心果的“城市文章”	(203)
第四节 行动派诗人张诗剑	(204)
第五节 黄河浪：“用脚步丈量历史”	(206)
第六节 清丽脱俗的秦岭雪	(208)
第七节 强调新诗归宗的蓝海文	(210)
第八节 诗人兼出版家傅天虹	(212)
第九节 黄灿然：另类“南来诗人”	(215)
第十节 林子、蔡丽双等女诗人	(217)
第八章 外来诗人的“香港经验”	(227)
第一节 港澳两栖的韩牧	(227)
第二节 “沙爹诗人”原甸	(229)
第三节 余光中的“香港经验”	(232)
第四节 钟玲：浪漫的抒情诗人	(237)
第五节 林幸谦：边陲的人生书写	(239)

评论卷

第九章 香港新诗评论发展轮廓	(243)
第一节 从主张写实到猛烈“台风”	(243)
第二节 本土意识的崛起	(246)
第三节 学院批评与圈子批评并存	(249)
第四节 多元自由的风貌依旧	(253)
第五节 缺乏经典文本和大家	(255)

第十章 在中国大背景下的诗评家	(258)
第一节 西洋文学深厚的林以亮	(258)
第二节 璞华：追寻幻美的诗评家	(261)
第三节 中西兼善的黄国彬	(263)
第四节 张曼仪的卞之琳研究	(266)
第五节 庄柔玉：探索朦胧诗心路历程	(269)
第十一章 与台湾共振互动的诗评家	(272)
第一节 李英豪的批评视觉	(272)
第二节 温健骝：批判现代诗的晦涩颓废	(275)
第三节 黄维樑：余光中研究专家	(277)
第四节 钱学武的余光中专题研究	(281)
第十二章 从本土出发的诗评家	(285)
第一节 坚持香港文化研究的梁秉钧	(285)
第二节 采用本土视角的羈魂	(289)
第三节 张詠梅对力匡的全方位研究	(291)
第四节 关梦南、叶辉“私绘”的香港新诗地图	(294)
第五节 为香港新诗建构典律的黄灿然	(299)
结束语 香港新诗史版图的焦虑	(303)
附录一：陷入评家是非圈的《香港新诗》(周良沛)	(312)
附录二：	
一 澳门：富有诗意的小城	(317)
二 澳门新诗批评发展概貌	(327)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338)

创 作 卷

第一章 近六十年的香港新诗

第一节 从“难民文学”到现代主义

据叶辉的考证，香港新诗在1924年黄天石主编的《小说星期刊》就已出现。(1)到了1930年代，出现了像易椿年、鸥外鸥这类本土诗人。另一些新移民作家，不是把香港视为罪恶渊薮的商埠，就是看作不同于祖国的英国殖民地。他们只知道香港的消极面，所写的诗作有相当的片面性。

在抗战时，为了逃避战争，不少内地作家和诗人远走香港。南来的第一代作家群一边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边进行包括新诗在内的文学创作。抗战胜利后，由于内战爆发，又有郭沫若、茅盾、戴望舒、

臧克家、袁水拍、吕剑、邹荻帆、黄药眠等大批南来的第二代作家群到香港，从事各种文化宣传活动，使香港又一次成为中国文学重镇。但这两次文学繁荣，均是内地作家和诗人做主力军，本土作家和诗人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即使有少数本地诗人从事创作，但他们眼观大陆而不曾注视脚下的香港大地。在文风上效法内地诗人，写的作品看不到香港地域色彩。

1949年10月，由于内地政局剧变和红色新政权的诞生，众多左翼文化人士

